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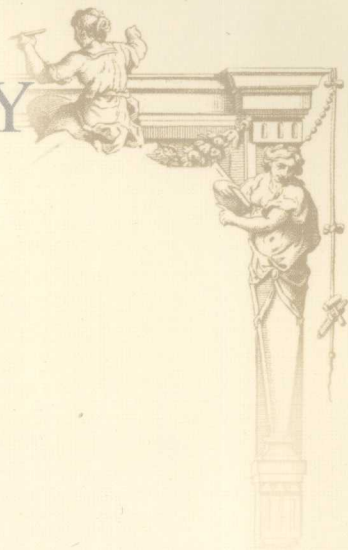
17

SECRET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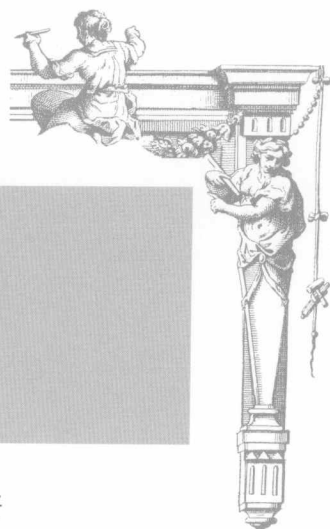
秘史

〔东罗马〕普罗柯比 著

吴舒屏 吕丽蓉 译 陈志强 审校注释



上海三联书店



秘史

〔东罗马〕普罗柯比 著

吴舒屏 吕丽蓉 译 陈志强 审校注释

SECRET HISTORY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史/(东罗马)普罗柯比著;吴舒屏、吕丽蓉译;陈志强审校
注释.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4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2513-7

I. 秘… II. ①普…②吴…③吕… III. 拜占廷帝国-史料
IV. 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797 号

秘 史

著 者/[东罗马]普罗柯比

译 者/吴舒屏 吕丽蓉

审 校/陈志强

注 释/陈志强

责任编辑/王秦伟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13.25

ISBN 978-7-5426-2513-7/C·200

定价:25.00 元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普罗柯比及其《秘史》

陈志强 吕丽蓉

一本奇书

教廷图书馆管理员阿勒曼尼(Alemannus)最近总是魂不守舍的样子,有时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图书阅览室里发呆,有时办事一反常态地丢三落四,甚至给教皇格利高里十五世(1621—1623年在位)送书期间,对于教皇的问话也所答非所问。和他一起在教廷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同仁私下里议论说,他可能是偶尔碰见了教皇及其情妇的幽会,或者是搅乱了他们俩的“好事”,所以整天忧心忡忡,担惊受怕被这个阴阳怪气的教皇处理掉。

这个猜测是靠不住的,因为那一年格利高里十五世病死了,新教皇厄本八世(1623—1644年在位)当选,新教皇待人和蔼。可阿勒曼尼还是提不起精神,还是若有所思的老样子。其实,旁人不知其中的奥秘,这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阿勒曼尼心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就是在格利高里十五世去世那年初,他在整理梵蒂冈图书馆西面书库里的旧书时,发现了一本手稿,是希腊文手抄本。那发黄灰色的书封面上写着“未公之于世”几个字,里面模模糊糊的希腊文虽然还能辨认,但只有在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凑到阅览室窗前才能看清。使他惊讶的是,这本书以污秽的语言大肆辱骂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

这个大名鼎鼎的查士丁尼,谁不知道!?!他可是一千多年前罗

马帝国的立法者，那部人人知晓的《罗马民法大全》就是他下令组织众多法学家编纂出来的。有人骂这个东部帝国皇帝就已经够奇怪的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书里有很多内容让他看了心惊肉跳，一些对皇后塞奥多拉私生活露骨的描写使他情不自禁春心骚动。虽然说，某些教皇在这圣洁的基督教圣城干些龌龊勾当也不足为奇，但是对于阿勒曼尼这样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的学者，他感到深深的自责和负罪感。

他不担心有人会发现自己的秘密，因为他的同事里没有几个看得懂这本书。如果他不说明，这个尘封了千余年的古老传说还将继续尘封下去，谁也不会知道的。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当初读此书的新奇感过后，他对这本书产生出来的许多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本写查士丁尼及其皇后的书出自何人之笔？他怎么会对东罗马宫廷里的事情知道得如此详细？这个作者一定是生活在宫廷贵族圈子里的人，那么他为什么对皇帝和皇后怀有如此深仇大恨？书里一再说“我在以前的书里说过”，或者“我在别的书里说过”，那么此书的作者一定还有其他作品问世，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些问题时时浮现在他脑海里，真的像书里说的“恶魔”一样挥之不去，又好像对着他狞笑的魔鬼发出讥讽的问话，“怎么样，你不知道我的底细吧！”

阿勒曼尼的同乡亚尼斯(Iannes)好像看出了他的心事，作为他的密友，曾经把他介绍到教廷图书馆来。亚尼斯比他大十岁，曾在希腊帕特拉的修道院留学多年。对于阿勒曼尼的问题多少有些答案。他猜想这本书出自6世纪著名宫廷作家普罗柯比手笔。因为，生活在查士丁尼宫廷里的作家中只有这个普罗柯比写过很多书。可是，普罗柯比写的书都是歌颂当时的皇帝的。两人一合计，决定把这本希腊文的书翻译成拉丁文。

刚刚着手翻译，亚尼斯就得了重病，弥留之际，他劝阿勒曼尼放弃翻译，断断续续地说：“自从提议翻译这本书，我就好像中了魔一样，也许是上帝惩罚我与魔鬼的接触，你可要好自为之。”

巨大的丧友之痛似乎激发起阿勒曼尼与魔鬼一争高下的激情。

此后几年，人们总是看到他默默地忙碌在图书馆里，直到有一天，他也病倒了。临终涂油礼上，他对神父说出了秘密，多少有些后悔没有听从好友亚尼斯的话。他还把自己翻译好的拉丁文本交给了神父，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和神父的宽恕断了气。拉丁文本的封面赫然标着《秘史》两字。

《秘史》很快在图书馆的同行中流传开了，特别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印刷技术使它的影响迅速扩大，只是在新出版的《秘史》中删去了有伤风化的部分。

那个时代的人大多知道“查士丁尼是一位正统立法的编纂者”，特别是对于17世纪的法学家们来说，根本不能接受《秘史》对他的指责。而亚尼斯的“普罗柯比猜想”也令他们产生怀疑，因为，普罗柯比这个作家从不说皇帝的坏话。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阿勒曼尼和亚尼斯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情，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这本奇书在随后兴起的启蒙运动新思潮中，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反对专制王权和宗教蒙昧的启蒙思想家们特别看重《秘史》揭露出来的宫廷丑恶，他们众口一词地将那个历来被人们称颂为“罗马法编纂伟人”的查士丁尼批判为“专制主义的典型”，而《秘史》则为他们提供了合理而充分的依据。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满怀赞赏的心情写道：“普罗柯比随着勇气或地位、受宠或失意的变化前后接连写了三部关于他自己时代的书——一部历史、一部赞歌和一部丑闻。”但也多少有些遗憾地指出普罗柯比在此书中笔锋过于尖刻，“这种卑下的信口雌黄的做法无疑毁坏了普罗柯比的名声，降低了他的成就”。¹

吉本的名气太大了，他关于拜占廷历史的意见影响了几代人。专门研究普罗柯比及其作品的学者如达恩(F. Dahn)、德比多尔(M. Debidour)和马勒特(Mallet)都同意吉本的看法，他们从来没

¹ 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5、176页。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作说明。——中译者

有怀疑过普罗柯比是《秘史》的作者。²

也不是没有人对《秘史》作者为普罗柯比的说法产生过怀疑。19世纪的欧洲拜占廷研究者们虽然不像二百年前的法学家那样否定亚尼斯的“普罗柯比猜想”，但他们认为，《秘史》的写作风格与普氏的其他著作之间态度的反差过于明显，一个作家怎么能在用阿谀奉承的口吻对君主歌功颂德的同时，又能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对同一个君主大肆谩骂呢？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德国学者利奥坡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在其专著中详细分析了《秘史》与普罗柯比其他名著之间的差异和《秘史》本身存在的诸多矛盾，他认为有可能是某个假托普罗柯比的人将朝野和民间流传的宫廷逸事记录了下来。³1889年，著名英国拜占廷学者布瑞(J. B. Bury)就此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395—900)》中提出《秘史》不可能为普罗柯比所写，他认为是一个“托名为普罗柯比”的人写下了这部矛盾重重的书。⁴只是到1906年，争论暂时告一段落，这一年，拜占廷学专家赫利在其出版的《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中有力地证实了《秘史》与普氏的《战史》和《建筑》在写作风格上的一致性。⁵1923年，布瑞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但他还是认为，即便是普罗柯比写了《秘史》，那也是在写作开始前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或是得了精神疾患。⁶此后，学者们对《秘史》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不再有什么异

2 Felix Dahn, *Prokopius von Casarea: Ein beitrage zur historiographie der volkerwanderung des sinkenden Romerthums*, Berlin: E. S. Mittler und sohn, 1865, pp. 2—6. Antonian Debidour, *L'imperatrice Theodora; etude critique*, Paris, E. Dentu, 1885, pp. 1—4. C. E. Mallet, "The Empress Theodora",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5 (Jan., 1887), pp. 1—20.

3 Leopold von Ranke, *Weltgeschichte: die Geschichte der abendlandischen Welt von den altesten historischen Volkergruppen bis zu den Zeiten des Ubergangs zur modernen Welt*, Essen: E. Vollmer, 1872, 1997, pp. 234—250.

4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1923, vol. I, p. 360—361. 他明确指出：“显然，本书的矛盾表明《秘史》的内容是靠不住的，它也不是普罗柯比的作品。”

5 A. Cameron, *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 Introduction, i.

6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1923, vol. II, p. 417.

议。但是，人们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是，普罗柯比如何完成了这些写作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

人格分裂的作家

是的，17世纪以来，人们对普罗柯比是否写了《秘史》提出的疑问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回答，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个著名作家怎么会表现出如此悬殊的两面性。

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廷历史上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对于这位皇帝的内外政策朝野中反对者可能不乏其人，特别是具有贵族背景的普罗柯比对这位农民皇帝心存不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如何做到在白天低三下四地恭维皇帝，而在夜晚恶狠狠地大骂同一个人呢？他怎么能同时写下充满了无限崇敬和无比痛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他是不是真的像布瑞猜测的那样得了人格分裂的精神病？

普罗柯比的《战史》写作风格承袭古典史著，历来被奉为拜占廷史书中的经典之作，而他的《建筑》一书除了有古典史书的遗风，又多了一层献媚与吹捧的色彩。这两部书基本上围绕着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铺陈。然而，《秘史》放弃了叙事风格而转向了对当权人物的诋毁与谩骂。尽管，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众所周知，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家本应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间谍就会发现，并且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但是，他所涉及的人物、他使用的语言、他写作时的情绪等等，使读者感到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普罗柯比在其《建筑》一书中开章明义地写道：“我写此书的真的不是想展示我的才华，也不是想表现我自诩雄辩，更不是想显露我对众多国家知识是如何广博，我根本没有理由斗胆有这般狂想。我多少次想要记录下历史上诸多国家得到了何等众多何等伟大的恩泽，对于这些前行者的回忆将传承千秋万代。”如果说这

样的陈述还属正常的话，那么而后他笔锋一转开始其颂扬查士丁尼的表白，“首先，历史将表明得到这些恩泽的臣民们对其恩主如何感激涕零，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感恩戴德，他们只是从其君主的恩泽中得到好处，他们永世铭记其皇帝的崇高伟大”。更肉麻的还在后面，他接着写道，“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皇帝查士丁尼，他领导危机重重的国家威名远扬，更加伟大辉煌”，“他把诸多蛮族国家都纳入罗马帝国，建立了许许多多城市，确立了纯正的信仰，堵塞了错误的思想道路，宽容地对待那些反对者”。他还将查士丁尼称为“伟大的立法者”、“伟大罗马帝国的保护者”，说这个皇帝“在边远的边疆完善了城墙和要塞，皇帝查士丁尼是我们时代之主，我想，人们应该正确地称其为天道大王，或者如荷马曾说的那种慈父领袖，那些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在他面前都不过是小儿科”。

可是，正是这同一个皇帝在《秘史》中被咒骂为“蠢驴”、“人形恶魔”、“吸血鬼”、“野兽”、“杀人魔王”、“白痴”、“披着人皮的魔鬼”、“低能儿”。普罗柯比一边歌颂着他的“慈父领袖”，一边大骂这同一个皇帝“善于欺骗”、“弄虚作假”、“奸诈不直”、“虚伪矫饰”、“两面三刀”、“冷酷无情”、“变态心理”，说这个皇帝“一意孤行，顽固不化，毫无顾忌地坦然从事极端丑恶的事情”，“对任何人都不会以诚相待，其一言一行总是显得特别狡诈，然而又很容易被任何想要欺骗他的人所哄骗。他本质上是愚蠢和邪恶的特殊混合物”。

我们不知道普罗柯比是如何以如此悬殊的心理生活在查士丁尼身边的，不了解他如何能够将刻骨的仇恨隐藏在心中而没有丝毫的表露，甚至能夜以继日地同时写出了一部对皇帝歌功颂德的作品。布瑞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普罗柯比的人格分裂产生自安全焦虑和愤恨心情的压抑，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的紧张情绪。普罗柯比身处社会变动剧烈的查士丁尼时代权力的核心，他的贵族背景和立场使他对来自社会下层的皇帝和皇后产生逆反心理，当他受到重用和信任的时候，这种逆反心理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是，当他因贝利撒留事件的牵连而受到怀疑甚至贬斥后，深藏的不满就转化为仇恨。

但是,这种仇恨无法宣泄出来。为了掩饰其仇恨他还不得不争取获得皇帝的好感,久而久之,普罗柯比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他担心自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皇帝的仇恨,担心皇帝的密探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这两种焦虑交互作用,使得普罗柯比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症状。

普罗柯比的人格悲剧在于,他内心深处与皇帝势不两立,但其才华又为查士丁尼所赏识,前者使他憎恨皇帝恨不得远离这个“恶魔”,后者因皇帝要利用其生花妙笔而将他留在宫中,他为了活下去并活得体面就不得不违心地为他极端仇视的人服务,甚至还要经常为这个人抹脂涂粉。他越是憎恶这个家伙就越担心自己会暴露出来,因此被迫把自己伪装起来。这种两面人的生活使普罗柯比的人格分裂。真实的自我被严酷地压抑,而虚伪的自我表露在外,这只能徒增其挫败感和内心的自卑,因而不相信任何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晚年的普罗柯比表现为典型的人格分裂,这在心理学上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这样看待可怜的普罗柯比,我们大概可以理解《秘史》了。

普罗柯比其人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公元500—565年)是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根据史家的考证,他比皇帝小近十八岁。也就是说,当查士丁尼于四十五岁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时,普罗柯比刚刚出道。由于他结识了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贝利撒留而受到重用,才华得以施展。仕途的顺达和才尽其用使他对查士丁尼的雄才大略深感折服。

事实上,普罗柯比如同当时其他拜占廷地方贵族子弟一样,为了获得仕途发展的机会,极力争取进入帝国政府,为此,他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文化教育,并按照拜占廷当局的规定全面接受法律学

习,在离凯撒里亚不远的著名的贝利图斯(Berytus)法律学校中攻读法学,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再进入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系统的教育使天资过人的普罗柯比很快就成了一名辩护律师。特别是他多才多艺,通晓多种西亚语言,并擅长古典风格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声名,他的一些习作甚至成为低年级同学的写作蓝本。

527年,青年将军贝利撒留被提拔为帝国东部波斯边境达拉要塞的统帅。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古代叙利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文件中普遍使用叙利亚语。由于普罗柯比通晓叙利亚语,所以被任命为贝利撒留的秘书兼法律顾问。⁷从此,普罗柯比开始其追随贝利撒留的生涯,而后者也因为其卓越战功权势日隆,此后成为普罗柯比的保护人。533年6月,贝利撒留被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奉命出征北非汪达尔王国。普罗柯比作为其顾问也随军出征,成为这位杰出将领的主要幕僚。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得到贝利撒留的倚重,故与之过从甚密,成为其家庭中亲密的成员,甚至参与了他的一些私人事务。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普罗柯比开始打算写一部以贝利撒留为主的历史,以记述查士丁尼发动的重现帝国梦想的伟大战争,并开始留心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事件。最初,这一打算并未形成完整的计划,因此,他收集的素材也失于简单,以至他后来在真正动手写作《战史》时,只能简略地描述第一次波斯战争。⁸

534年,贝利撒留在取得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后,将被征服的非洲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拜占廷将领所罗门,他本人奉召返回君士坦丁堡,接受皇帝查士丁尼为庆贺其卓越战功举行的盛大凯旋式。当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离开非洲后,普罗柯比继续在非洲留任。在此期间,他目睹了536年初拜占廷驻扎北非的军队因军饷问题发动的兵变,亲身感受到当地柏柏人土著居民袭击拜占廷

7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1923, p. 429.

8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B. Dewing, vol. I, London and New York: Heinemann, 1924—1928, 12—22.

军队造成的巨大恐慌，这更加深了他对贝利撒留军事才能的佩服。因此不久以后，普罗柯比主动请求离开北非，前往直意大利，再度回到贝利撒留麾下，成为指挥远征意大利的拜占廷军队的统帅贝利撒留的幕僚。535年，贝利撒留受命统领拜占廷远征军前往直意大利，首先在西西里岛登陆，挑起了哥特战争。这场战事从535年一直持续到554年，由于哥特人早已经熟悉了拜占廷人的战略战术，因此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最初，贝利撒留攻陷了亚平宁半岛西南部的那不勒斯，占领了罗马与拉文纳，而后就陷入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在相持战中，朝廷中出现了不利于贝利撒留的传言，他也因此于540年应召回京。正是在他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哥特人在极具天赋的国王托提拉领导下，迅速扭转了失败局势。540年，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东部首府拉文纳陷落，普罗柯比被迫与贝利撒留一同回到首都。544—548年，贝利撒留再次被派往意大利，但他也未能取得重大胜利，甚至还一度使拜占廷军队遭到惨重伤亡，曾经征服的土地被哥特人悉数收回。罗马城在拜占廷军队与哥特人的拉锯战中已成为一片废墟。552年，查士丁尼再派帝国将军纳尔西斯增援，使拜占廷远征军取得了最后决定性胜利。而后，拜占廷人继续发兵比利牛斯半岛，进攻西哥特王国。查士丁尼还向西地中海远端派遣海军部队，征服了西地中海上全部岛屿、许多沿海城市与要塞，最终使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陆湖。

从此以后，普罗柯比除了奉旨偶尔出访外地或外国，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因此他目睹了542年发生在京城的大瘟疫。这次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危害范围之广，病患死亡人数之多，造成的破坏之严重可谓空前绝后。在这次瘟疫中，查士丁尼也未能幸免。

在皇帝患病期间，人们以为他也难逃一死，因此为他准备了后事，还初步确定了皇位继承人。然而，查士丁尼躲过了死神的打击，从大病中逐渐恢复过来。他错误地认为朝野贵族中存在密谋反对自己的阴谋，并进行了大清理，贝利撒留也被卷入其中。虽然

后来的审理证明并无可靠的证据表明贝利撒留涉嫌此事，但因其功高盖主，不久后仍被解除了军事统帅的权力，其部分财产也被没收。作为贝利撒留亲信的普罗柯比也难逃厄运。

当贝利撒留的许多朋友都因利害关系而被禁止或主动中断了与他的联系时，普罗柯比可能还继续保持与这个被冤屈和冷落的帝国功臣的关系。也许正是他对贝利撒留的忠诚阻碍或至少延误了他的仕途发展，他在帝国行政部门再也没有获得升迁的机会了。他中断了在帝国朝廷机构中的生涯，被迫重操旧业，在法庭中作了辩护律师。

在任职律师职业期间，他审理的许多案件涉及中央政府，由此发现了查士丁尼的改革措施对律师职业的不利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帝国朝野事务的深入了解，普罗柯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贵族背景使他对查士丁尼的看法由不满转变为厌恶，而后由厌恶变为憎恨。也是在他长期留住京城君士坦丁堡的岁月里，他完成了几部杰出的作品，即《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建筑》(*The Buildings of Justinian*)和《秘史》(*Secret History or Anecdota*)。《战史》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活动，而《秘史》则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安东尼娜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其流溢着古典文风的大量散文与书信也流传下来，与其三部名著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其优美典雅的文笔使其作品成为拜占廷文学史中的上乘之作。

544年，贝利撒留再度受宠，并被委任为拜占廷军队统帅，第二次出征意大利(544—549年)。大概就是在此期间，普罗柯比对贝利撒留的态度由崇敬逐渐转为鄙视，他认为这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帝国功臣不应该再为查士丁尼效劳，这种鄙视后来转变为敌意。他曾抱怨说，贝利撒留根本没有兑现其对朋友们的诺言，显然这是指普罗柯比对他的这位保护人违背诺言失信于普罗柯比的行为。

关于普罗柯比的后期职业生涯,我们缺乏任何确切的史料。但从他的书中,我们还是了解到,普罗柯比后来还获得过“显贵者”(Illustres)的称号,表明他确实拥有过很高的行政职位并成为元老院的成员。也许,脱离了贝利撒留保护的普罗柯比,凭借其出色的写作才能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并因此获得了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和贵族称号。

后世史家根据普罗柯比同时代作家的记载了解到,562年曾有一位同名的普罗柯比担任了君士坦丁堡市长。但是,人们难以确定这位身居高位的普罗柯比是否就是那位妙笔生花的历史家普罗柯比,因为,以普罗柯比为名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者,同一个普罗柯比因为公务繁忙而无暇写作了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人们至今也无法证实普罗柯比是哪一年去世的。

普罗柯比的政治立场

普罗柯比作为拜占廷历史上杰出的作家,与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对世事的洞悉和对人生及社会哲理的思考促使他不断地审视其所处的世界,也许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有过盲目崇拜查士丁尼的时期,也许他对为其发展提供某种保护的贝利撒留产生过感恩戴德的感情,但是,知识分子的天性和他的贵族出身决定了他与当局特别是对皇帝的对立的政治立场。

普罗柯比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家,这除了其文学与历史天赋外,还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关。查士丁尼统治时

9 拜占廷帝国的历史通常被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但就其具体年代划分,学术界有多种不同意见。其中关于早期拜占廷历史分期,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330—610年,即新都君士坦丁堡正式启用至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统治结束,见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和2006年版,第6—13页;《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49页;(2)324—565年,即君士坦丁一世统一罗马世界至565年查士丁尼统治结束,徐家玲(转下页)

期(Justinian I, 527—565 年在位)⁹正是拜占廷国家由古罗马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廷帝国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剧烈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为普罗柯比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查士丁尼执掌帝国大权后不久,即大力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了规范社会各个阶层人群的行为,他首先下令编纂《罗马民法大全》。以大法官特立波尼安为首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经过数年的努力(528年至533年),陆续编成《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法学阶梯》和《新法》。这些法典强调皇权至上的观念,严格阐述君权神授的原则,同时以严谨的公法和私法概念建立起完整的罗马法律体系。为了强化皇权,查士丁尼继续实行戴克里先皇帝在3世纪开始推行的皇帝崇拜礼仪,仿效波斯等东方国家,制定了大量对皇帝顶礼膜拜的礼仪制度。为了提高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效率,查士丁尼还进行了重大的行政改革,调整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取消多种无用的传统官职和贵族称号,贬低大贵族的地位,提高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官员和新贵族的地位。作为罗马共和体制遗存的执政官职位于542年被取消。他还改革地方政府机构,将数量众多的小行省合并为大省区,取消大政区和行省之间的政区组织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在小亚细亚和北非推行军政合权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在拜占廷军队重新征服的拉文纳和迦太基两地推行军、政、司法诸权合一的总督制。对于查士丁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普罗柯比内心深处加以抵触,认为这个皇帝“是一切高贵传统的最可怕的破坏者”(第6章)。

为翦除不利于专制皇权的旧贵族和旧王朝势力,彻底消除古罗

(接上页)《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14页;(3)324—610年,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章;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chap. II;(4)5世纪初拜占廷历史自身特征逐步显现至867年阿莫利王朝(820—867年)统治结束,见R. Browning,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hington D. C., 1992, chap. I。以上几种意见虽有分歧,但均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作为早期拜占廷历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